

日本人与 中国人

陈舜臣 著
张宪生 译



译者的话

《日本人与中国人》是日籍华人作家陈舜臣的一部文化比较随笔集。在这本书里，作者基于对日中两国文化的丰富知识和日本社会的透彻认识，选取一些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和历史上的事例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剔出潜藏在现象与事例中的各自文化的本质特征，作出相应的结论。书中材料之平淡无奇与结论之新颖独特形成强烈的对比，令人感到这的确是集作者长年观察思考之结果的一本书。另外在比较研究方法上，本书也有独到之处。过去的研究大多着眼于中日两种文化的相近之处。陈舜臣则主张考察研究中日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查明中日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由此入手正确地认识两国文化，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在这里也可以感到作者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往来所抱的希望和期待。

近年来我国关心中日文化问题的人日益增多，东方文化（其中特别是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呈兴起之势。《日本人与中国人》中译本若能在促进这一势头发展起到一点作用，也算实现译者的心愿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日文原版初版于1971年8月，书中当时列举的事例与目前的现状会有某些不尽相符的地方，而且作者受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其若干看法和结论

也未必准确，甚至带有某种偏见和误解，为了保持原书的完整性，基本上未作删节，请读者加以思考和鉴别。

学友梁卫权提供了《日本人与中国人》日文原版书的材料，何思颖对译文初稿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本书译文如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张宪生

1988. 3. 22.

原 序

这本书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随笔集。

几年前，我写了介绍我的居住地神户的书，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写随笔。最近又把曾写进小说的鸦片战争以实录的体裁编成一本书，不过那实际应划入纪实文学的类别内。

短篇的随笔倒是写了不少。写过的东西有些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最早的一篇现在仍记忆犹新。我的小说处女作是昭和36年10月（1961年10月）出版的。随笔的处女作则登载于同年12月的《朝日新闻》上。本来是朝日新闻社大阪总社约的稿，但是后来也登在东京版上了。总共是四页原稿纸，出的题目是《岁末风景》。在这篇随笔中，我写了下面一段话：

“……12月22日是冬至。这确实是一个有一些由来的日子。但是我从童年时代起只知道这一天是‘吃糯米汤圆的日子’。每年吃过了冬至的糯米汤圆，才觉得已近年末了……”

我的本意是介绍中国人家在年末时的种种生活情景。虽然我并没说这就是所有中国人家中的年末生活情景，

但是读者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另外我也是以这样的意图写作的。

就在冬至那天，这篇文章登出来了。那天早上，一位广东籍的朋友挂电话说：“我们没有那样的习惯。”

几天后，在街上碰到一位原籍北京的人。他特意叫住我，并告诉我说，在北京，冬至时不是吃糯米汤圆，而是吃馄饨。

我有点慌了，便找了原籍为中国其它地方的人打听。最后才明白：冬至时吃糯米汤圆似乎只是限于台湾和福建两省的习惯。

作为一篇随笔处女作，应当说是有漏洞的。不过，我把某一地方的风俗习惯看作全国性的习惯，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执笔时，我隐约地记起了过去曾读过的一首诗。作者的姓名和诗句都记不完整了，只记得是在某间茶馆里糯米汤圆上桌时作的诗。那天并非冬至。大概是菜单里列有糯米汤圆吧，当诗人知道这家店子每天都有糯米汤圆时，便兴致大发。诗中有这样意思的句子：这里每天都仿佛是冬至。

中国的方言很多。但是只要书写成文字就可以通用于全国。特别是诗，它是以用普通话来理解为原则的。由此我便确信冬至时吃糯米汤圆是中国各地都有的习惯。那首诗大概是当地的文人、或是因旅行公干了解了当地习俗的人的作品吧。

几年前自己的一个失误，在这篇序言中公开出来。在这本书中，也许我又犯了同类的错误。自己认为有根据而写成的东西，实际上那根据可能会不可靠，或者错误。这类情况是常有的。在此先提醒读者留意这一点。

将来也许遭人嗤笑，不过我仍斗胆写了这本书。

一个生长在日本的中国人，从懂事时起就经常思考中国与日本的事情，自认为在这一方面有了一点积累，因此想让别人也知道自己的这些想法。希望这本书能在促进日本与中国的相互理解上起一点作用。

本书的作者只有在日中友好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类似冬至的糯米汤圆的陷阱到处都是，对此我是很清楚的。之所以甘愿冒这份风险，是因为有一股欲罢不能的力量使然。我将掌握住自己的热情，写作下去。

陈舜臣

目 次

第一章	有关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问一答 ——你到底知道多少?	1
第二章	唇与齿——交往的历史 ——见于中国古典中的日本历史	23
	关系淡泊的邻居	25
	用作指挥信号的折扇	32
	服从军旗的指挥	38
第三章	“面子”与“哀婉之情” ——最根本的区别是日本没有黄河	45
	人人争学新事物	47
	胡服骑射	52
	同出一源	56
	差异	61
第四章	语言的神秘性 ——迷信“同种同文”说法的危	
	险性	69
	踏标	71
	适当地朦胧化	78
	不要天真地相信同种同文	85
第五章	“血统”与“文明” ——日本文明的源头在“对血	
	统的信仰”之中	97

	崇尚血统的观念	99
	文明出自中原	106
	文明的边缘	111
	最根本的差异	116
第六章	“完全”与“不完全”	
	——重视均衡的中国人与喜好不	
	均衡的日本人	121
	捣毁石碑的人们	123
	莫拉艾斯的悲剧	132
	对称性	137
第七章	“人的特色”与“适度”	
	——仅看自杀一点，也存在如此	
	多的差异	141
	描写罗敷的诗歌	143
	全知全能的人	147
	自杀的仪式	151
	政治就是文化	156
第八章	我们邻居之间	
	——能够相互取长补短的国家，	
	这是神旨的安排	167
	名与实	169
	龙与凤	175
附：解说	〔日〕尾崎秀树	185

第一章 有关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一问一答

——你到底知道多少？



“中国人是商业天才”——某贸易商的感想。

一位退休的原贸易商社的董事说道——

“中国人实在是擅长经商，简直可以说是天生的商业民族，即使是犹太人也得甘拜下风。以我多年的经验，可以断言这一点。我在战前曾在上海生活过六年，天津两年，广州四年，我以自己的眼睛确认这一点，不会有错。与我打过交道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商业天才。你以为如何？

答——

你受商社派遣，曾住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广泛地考察了华北、华中、华南，即考察了中国。怀有“了解中国”的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你接触的中国人大概全都是商业方面的人，而且只限于通商口岸城市。

通商口岸城市的中国商人处于不利的条件下（外国人拥有各种特权），因此，不奋发努力便无法生存。他们调动起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思考能力才成为一名商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只有那些真正具备商业才能的人才能成为商人。

在通商口岸城市中想成为一名商人而终遭失败的人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或转到更小的城镇，在那里经营小本生意；或者转到商业以外的行业，有的沦为卖体力的车夫或苦力；或者回到乡下租佃田地耕作；或者成为受人雇佣的按日计工钱的雇工。

一开始就胸怀大志，为了成为一名商人而来到通商口岸城市的是极有限的一部分人，只不过是极小部分的人。以较乐观的估计，一万人当中大概有五百人上下吧。如果假设这些人中的十分之一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商人，那么，最后只有五十人。

你说你接触过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商业天才。事实的真相是，只有商业天才才能出现在你眼前。在你接触过的五十个中国商人的背后，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个缺乏商业才能的中国人，这一事实请不要忘记。那些人甚至连与你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手边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我想你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工作时期，全中国人口约有80%为农民。

他们根本不具备商业才能，无望地在地主的欺诈、沉重的赋税下挣扎，除了拼命干活外别无出路。他们几乎“毫不例外”地都是拙于拨动算盘计算收益的人。若是具备商业才能，他们绝不会长久地停留在如此糟糕的境遇中的。

中华民族即是商业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认识，由上面便可明白吧。

在东南亚各地，华侨掌握着商业命脉，这一事实已为人熟知。但是其范围往西止于缅甸。再往前——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自不待言，中东、非洲一带已经是印侨（准确地说印度及巴基斯坦籍的商人）的势力范围，商业天才的华侨们也无法与之抗衡。

——印度人做生意真厉害。容不得一点大意。脑子转得慢一点，就得连本都赔光。

我在神户干贸易商的时候，曾听日本商务人员这样说过，当时觉得很诧异。我所在的商社与印度方面的商社很少有商务来往。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我在外国语学校学习印度语时，教授我的是一位叫法尔马的印度教师，一位简直可以称作释迦牟尼或神明般的人。

当时正是战争中，学生们都荒废了学业，不怎么学习。时常逃课，还调皮捣蛋。尽管如此，我仍没看到法尔马先生发过一次怒。他学识渊博，是宽容、诚实与献身精神的化身。

我一直认为印度人都是像法尔马先生那样的人。所以听到别人说印度商人很狡猾时，便觉得诧异。

不过，令日本商人为之蹙眉的印度商人并不是印度人的典型。

印度是一个种姓等级制度很严格的社会，原则上职业也是世袭的。几百年来一直经商的家族里出现商人中的佼佼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从印度全国人口来看，印度商人阶层的人数也是微乎其微。

不能仅仅根据自己所接触的人来判断一国的国民。

日本人现在被称为经济动物，名声很不好，这也是外国人看到那些从早到晚拼命工作的日本驻外商社职员而赠的戏称。

“从日本文化中除掉来自中国的成分还将剩下什么？”——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意见

一位从香港来日本的中国历史学家说过下面一番话：

“从日本文化中除掉来自中国的成分，还能剩下什么呢？力图探寻日本特色和事物的人们只能靠勉强的牵强附会才能解答这一问题。已故津田左右吉^①博士曾说过：‘由法隆寺^②的建筑、三月堂^③的佛像无法追缅昔日日本人的情调。相反，映入我们眼中只有冷峻的技巧，要末就是考古学的材料。因此，至少是至奈良时代^④为止的艺术只是中国六朝至唐代兴盛的艺术的标本和模仿，而不是我们民

①津田左右吉（1872～1961），历史学家，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著有《反映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等。——译者注

②法隆寺：奈良县生驹郡内的佛寺。据传建于607年，后遭大火，又于公元760年重建。该寺为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料建筑物。——译者注

③三月堂：奈良东大寺法华堂的通称，为寺内最古老的建筑，据传始建于天平5年（715年）——译者注

④奈良时代：日本历史年代名称，即建都平城京（奈良）的时代。起止年为：710年至784年。——译者注

族的艺术……’（《反映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之研究》）。津田左右吉不愧是一位博学之士。除掉了中国文化成分，当时的日本就一无所有了。从一无所有之处将能产生什么呢？简单地说，日本这个国家不就是很成功地模仿了中国，又抓住了适宜的机会，将模仿的偶像转换为欧洲吗？再有就是剑术特别厉害。除此以外，日本还有什么可取之处？”

答——

你至少是一位学者。你具体的专业是什么我不知道，听说是研究历史的。你作为历史学者，仅有如此程度的认识实在令人难为情。不过这也许没有办法怪你。关于日本，在中国仅有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和戴季陶①的《日本论》等（1928年）几本可数的专著。

你的话，听起来与戴季陶的《日本论》中如下的一节很相似：

①戴季陶：1882～1949年。原名传贤，笔名天仇。生于四川省，原籍为浙江。16岁时留学日本，就学于政法大学。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在日本作《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时戴任翻译。宫崎滔天曾称他的日语比日本人还高明，是中国有数的知日家之一。历任黄埔军官学校（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立的学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官，中山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战争期间为最高国防委员会常任委员。但戴热衷于佛教，未见有政治活动。戴季陶感情的起伏变化急剧，曾多次自杀未遂，1949年（昭和24年）的死据说为自杀。——原注

——如果从日本的历史文献中完全去掉中国、印度、欧美的文化将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剥去外来文化后留下的日本的原有本质部分，我想与南洋土著人毫无两样吧。

“文明为人类之公有物”——知日家戴季陶的观点。

自然，上面这段话是戴季陶以其独有的方式对日本人在脑子里深深刻上“日本特点的”几个字、强调日本独特的文明所作的揶揄。这从文章的前后关系也可明白。在同书的其他地方他曾说到“文明原本是人类的公用物”，同时还承认自尊心是一个民族的立足点。

伊瑟亚·贝恩达桑（《日本人与犹太人》的作者）最近反复谈到“日本教”，令日本人为之叹服。实际上戴季陶在距今四十多年前已言及过“日本人的‘日本狂’”，不过并未加以否定，只是指出“日本狂”已完成其使命，今后将失去作用。

对于你如踢开路旁的一块石子一般轻易地作出“很巧妙地模仿”、“抓住了适宜的时机实行转换”、“剑术厉害”之类结论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取进一步思考的态度。

不过，这是对大学者提出十分失礼的批评了……

戴季陶曾与日本妇女恋爱，甚至还和日本妇女生了孩子（孩子送到某个有名的家庭作养子）。如此看来，对于他来说，日本绝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贝恩达桑也出生、成长在日本（他的经历如果真如他自述那样的话），相信对日本也怀有感情。

你与日本没有联系，所以才那样简单地作出评论。

我丝毫没有要强迫你对日本怀有感情的意思。没有联系，自然是没法轻易地产生感情的。

今晚，我愿陪你到先斗町^①去走走，你以为如何？过几个月，你的看法也许会改变的。

“兼收并蓄的日本人”——一位天主教神父的比较论

一位法国籍的天主教神父谈过下面一段感想：

“我到日本之前，曾在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从事过布道工作。调到日本以后，与那一段相比较，到底是容易工作了呢，还是难做了呢？连自己也弄不清楚。谈到容易做工作的一面，日本人似乎大都乐于接受和学习任何东西。中国人则不是这样，将儒教、佛教、再加上道教非常小心地掺合在一起的奇妙的生活体系，他们怎么也不愿放弃。在这一点上，日本是容易做工作的。不过倒是太容易做了。毫无抵抗地就接受了外来之物……自己所说的是否真正深入对方的心里？人们时时对此感到疑惑。中国人不太容易敞开胸怀，但是一旦敞开了，便可感到一种深入对方心里

^①先斗町：位于日本京都市区内的一条艺妓较集中，日本传统艺术色彩较浓的街道。——译者注